

河运与国运

——国家治理视角下黄河治理史的思考

□ 张景平

如果发放一份问卷，要求受访者举出几种可以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标志性符号，黄河的出现率一定名列前茅。这条世界含沙量最大的长河造就了广袤的华北平原，大小支流将黄土高原切割得千沟万壑，同时却在尾闾把陆地一点点向海洋推进。这条河流所形塑的却远不止是中华大地的自然景观，更为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根本气质的生成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黄河与政治的关系又最为突出。从“黄河清圣人出”的美好理想想到“挑动黄河天下反”的燎原起义，从宗泽三呼“过河”的无奈悲壮到“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慷慨激昂，黄河不但未曾缺席过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更在这个国家漫长的成长进程中不断考验着人民的智慧。“河运”与“国运”历来紧紧交织在一起，“治河”成为历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表现。

“治河”何以成为历代王朝的核心事务

黄河之所以在中国政治史上有如此崇高地位，其原因极为复杂，但其核心无疑包括下述三点内容。

防洪的压力。与世界其他大河相比，黄河最大的特点在于其巨大的含沙量，这造成了黄河下游河道极易在平原地区发生摆动，并由此造成淹没范围巨大的洪水。众所周知，黄河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曾长期是中国文明的核心区域，即使近一千年来经济重心不断南移，该区域仍然人口稠密，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原大地这片膏腴沃土，必然要求历代政权保持黄河河道稳定并实现对洪水灾害的有效防御。从战国时期开始，黄河下游堤防开始全面修筑，此后两千多年时间里，围绕千里黄河大堤的一篇篇防洪史诗即不断上演。

灌溉的需要。黄河流域水资源禀赋十分有限，上游的许多区域处于干旱区，无灌溉即无农业；中下游许多区域虽降水量稍多，但降水时间分布不均衡，若需稳产高产亦需开展补充灌溉。黄河支流泾河上著名的郑国渠，为秦横扫六国最后夯实了经济基础；宁夏平原与河套平原引黄渠道的建设为秦汉王朝屯田事业提供了基本的水利保证，并将这些区域变成防御北部边患乃至向亚洲腹地进军的大后方与根据地。

（上接1版）

在捍卫党和国家利益的同时，促进各国合作共赢。70年来，党的对外工作始终从党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坚持原则、不惧挑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有力党在激烈国际竞争和大国博弈中牢牢掌握先机主动发挥了独特作用。与此同时，党的对外工作始终秉承相互尊重、完全平等的理念，将实现各国合作共赢作为一以贯之的追求，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我们党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充分尊重。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对外工作进一步开拓创新，探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共产党特色的党的对外工作新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党的对外工作传承过去70年波澜壮阔的对外交往优良传统，高举习近平外交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对外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最后交通的依赖。黄河流域干支流目前已基本无航运之利，但在历史上曾长期发挥着骨干交通线的重要作用。汉武帝曾乘坐楼船沿黄河与汾河巡视山西并祭祀后土，而黄河与渭河水道更是汉唐时期关东向关中输送物资的重要通道，东晋刘裕的内河舰队曾经从南方一路北上直取洛阳、长安。在大运河开通、政治重心东徙之后，黄河的直接水运功能降低，但其横亘东西的地理位置却对维持运河畅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故明清两代始终将运河与黄河的治理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予以通盘考虑。至于黄河上游，以皮筏为主的内陆航运业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都是西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方式之一。

总而言之，防洪关乎核心区域的生命安全，灌溉保障农业时代的经济基础，交通维系大一统国家的政治稳定。围绕黄河的这三件大事，无一不与王朝的兴亡休戚相关。在这个意义上，“河运”关乎“国运”，也就不足为奇。

黄河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反映

既然黄河如此重要，历代政权无不下大力气投入黄河治理活动。正如黄河的巨大含沙量构成这条河的鲜明自然特色，黄河治理活动也始终体现了中国这一东方大国独特的政治特色。在农业社会中，人口无疑是最为重要的生产力要素，无论治堤、开渠或疏浚河道，大量人口的动员都必不可少。在治河过程中，古代中国的国家机器展现出强大的人口动员能力。在西汉与北宋，军队曾多次被作为抢险堵口的主力军；而在其他时期，征调数万规模的民夫从事河工修造亦是屡见不鲜。著名的瓠子堵口中，汉武帝亲自指挥，群臣不分贵贱皆投入工地，生动体现了国家治河动员的森严与有力。元末的治河活动之所以能成为“挑动天下”的导火索，首先与治河工地上大规模的人口聚集有关。

为了实现高效的人口动员，同时实现对各类工程建设与维护的有效掌控，古代中国的集权体制一直在探索使用各种制度工具。科层管理、分工细密的职官制度一直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特色。中国古代一直存在“因事设官”的传统，既然黄河是为“大事”，专门的治河职官自然不可或缺。汉代有大司农治下的各级水官，北宋曾专门设“疏浚黄河司”，明清时期更是先后出现“总河”“河道总督”这样的专门高级职务及其下属的

一套复杂职官体系。历代河官体系经过不断优化，巨大的治河责任被很好地分解到每一个基层治水单位，不但水情可及时上达，中枢意志亦可得到很好的贯彻。传统政治体系下的治河是一个复杂系统。除职官体系外，在财政方面有单列的“河工银”等名目，工程组织方面有“以工代赈”等制度。为了实现对黄河大堤更有效率的巡视、维护与抢险，各级行政区划甚至都可以灵活地予以调整。

在治理黄河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各政权不但注重管理，更注重把先进的水利技术与治水思想及时运用于治河过程中。王景、郭守敬、潘季驯、靳辅等历代杰出的技术人才都曾执掌河政，他们的治河理念皆可构成黄河变迁史上的重要节点；即便不以技术著称的政治家王安石，也曾亲自推行过先进的河道疏浚之法。农业时代，技术常常面临失传，但历代官修的河工著作不胜枚举，都试图借助国家的传播力量把先进的治水技术予以稳定保留。其中著名的如宋人沈立之的《河防议》一书，因汇集了当时较为先进的治河方略，被金朝都水监出面将其刊印，而宋、金本为敌国。

毋庸置疑，在漫长的封建专制时代，黄河的治理当然不能尽如人意。不可计数的海量口改道、治河工程中的腐败贪墨以及卷入高层权力争斗的治河纷争，都是国人所熟悉的历史场景。在传统的治乱周期中，“河运”伴随“国运”摇摆不定。但以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进行观察，两千年黄河治理毕竟集中体现了农业时代中国国家治理水平，虽有历史的局限性，但其中浸润着前人的智慧与心血，理当为我们所铭记。

黄河安澜七十载是当代中国治理能力的突出体现

1949年之后，黄河与古老的中华民族一道，进入了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九曲黄河终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安澜。黄河安澜不是上天的恩赐，而是全体黄河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治理能力的集中反映。具体而言，包括如下三点。

黄河安澜七十年，得益于各级党组织强大的组织与执行能力。1949年之后，黄河虽多次遭遇重大洪水威胁，却从未出现过大堤决口。如1958年7月的黄河特大洪水，冲垮了京广铁路郑州黄河大桥，直接威胁黄河下

游数千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没有水库错峰调峰、缺乏机械化抢险手段的客观条件下，周恩来现场指挥、国家防总与河南省委坚强领导、各级政府与党组织周密部署，不仅依靠人民的强大力量守住了黄河大堤，并且实现了不向蓄洪区分洪的历史奇迹。

黄河安澜七十年，得益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1949年后，各级政府在职力、物力都不富裕的情况下，在黄河流域兴建了大批防洪、灌溉以及发电工程，这些现代水利工程在总体上发挥了巨大的效益。作为国家战略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天然林保护以及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程，极大减少了黄河的输沙量，从根本上减轻了河患的威胁。

黄河安澜70年，得益于来自顶层的科学决策、统筹规划。水沙关系始终是黄河治理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七十年来，在政府统一布局下，各高校与科研院所从河流动力学等角度对黄河水沙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为相关政策制定与工程设计提供了科学的支撑。20世纪70年代后，黄河流域水资源消耗一度增长过快，黄河下游出现断流。为此，中央层面出台了“八七”黄河分水方案，中国当代水权制度建设由此展开；在一系列有效的行政与法律手段支持下，黄河重新实现“入海流”。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在总体上呈现向好局面。

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国运”盛则“河运”兴。当代黄河是历史黄河的延续，当代黄河是未来黄河的前身。无论如何，黄河与中华民族的密切而独特的因缘都将继续，黄河与政权、黄河与国家治理的关系将不断注入新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重大国家战略。可以预见，有着数千年历史的黄河治理事业将迎来新的历史时代。自觉把新时代的“治河”作为促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抓手之一，不断从历史中、从实践中、从科学中总结治河经验，不断探索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与中国文化的优越性，实现“河运”与“国运”的腾飞，是需要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完成的历史答卷。



格局转型过渡期，党的对外工作保持战略定力、善用战略方法、维护战略机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提供服务与保障。

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推动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不断实现新跨越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加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党的对外工作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就必须不断坚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牢牢把握实现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紧紧围绕“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与世界关系以及如何构建这种关系”这一主题，锐意进取、攻坚克难、砥砺前行，不断开创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新局面。

一是加强对国际社会的政治引领。当前，如何让让世界认识真实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快速发展的中国、学习并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党的对外工作将进一步以加强政治引领统揽

我国古代文化史上百家争鸣的鼎盛时期非春秋战国时期莫属，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其音乐美学思想核心是崇尚礼乐、仁义及中庸之道。孔子，作为一位对后世在政治、社会、文化、音乐诸方面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我国历史上对音乐美学概念的界定和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末期，曾被孔子针砭为“礼崩乐坏”的社会。其中孔子对郑声的厌恶感尤为强烈。郑声，即春秋时期郑国的民间音乐，其特点是具有丰富的音乐表现力，同时又有巨大的感染力。但与孔子所倡导的“中庸之道”，即体现在“翕翕地，纯纯地，皦皦地，绎绎地”尚中和之美的雅颂之音相去太远，故被孔子所摒弃。因此“中和”被世人视为儒家音乐美学的一个重要审美基础。

儒家美学的“中和”观

孔子在其著作《中庸》中对“中和”思想是这样阐述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者，和也，正所谓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淫不伤，乃孔子音乐美学思想的基础。孔子在他的《论语》中提出了“尽善尽美”的音乐审美标准，“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其中“美”是指音乐形式美好，旋律悦耳动听；“善”则指音乐作品内容健康安善。由于武乐所表现的是武王通过征服和杀戮而得天下，与孔子所推崇的仁爱思想相去甚远，故孔子认为武乐虽有美的形式，却不符合道德要求。因此，“仁”作为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核心，无论从音乐美学的审美标准，还是从音乐对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影响方面均树立了一个严格的规范。在过去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孔子“仁”的儒家音乐美学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即使现在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音乐与社会和谐的关系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认为人的个人修养是从学《诗》开始的，继而自立于对礼的学习，但最终要通过对乐的学习来达到正德、修身、陶冶情操，以期达到人格修养的人生最高境界。

儒家音乐美学思想认为，“乐者，德之华也”。人们学习音乐的目的在于其不可估量的教化作用。音乐，作为一门集文学、社会、政治、经济等学科于一体的艺术，它所表达的人类情感特征非常明显，对人们的情感、价值观、意志及品格等方面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要达到“尽善尽美”的音乐理想，除了对音乐本体的形式审美追求外，对至高无上的道德情操境界的完美融合也是其

尚音乐雅和之美

□ 张春茂

不舍的追求之一。《乐记》作为先秦音乐美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几千年来，指导和规范着中华民族音乐美学思想。其丰富的内涵已成为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精髓和灵魂。

《乐记》对音乐的教化作用以及其对社会稳定诸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作了详尽的阐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快乐祥和之音，多产生于政通民和的太平盛世；充满着悲愤怨怒的音乐，说明社会动荡，社会矛盾凸显；哀伤之音多产生于民不聊生，世政岌岌可危的亡国之时。音乐与

社会政治是相通的。纵观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民族文化历史进程，音乐艺术犹如璀璨的明星，点缀着中华文明的历史，熠熠生辉。从雅和之乐《阳春白雪》的修身养德，到“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所阐释的因乐而生的忠贞不渝的友情；从“四面楚歌”引发的霸王别姬的英雄气短之悲剧，到商女犹唱亡国之音“后庭花”；从洪钟大吕，彰显着正大庄严的人伦有序的宫廷礼乐，到刺古讽今，教化民众，抑恶扬善的民间俚曲小调。把音乐的教化作用及其对社会政治的影响揭示得淋漓尽致。



党的对外传播工作，不断提升我们党的国际影响。

四是发挥好党中央决策的参谋助手作用。要继续深入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意义、各国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和执政规律、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走向等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为我们党增强执政能力、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考验作出应有贡献。中联部在跟踪研究国际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发展变化、世界政党政治、社会思潮和外国政党治党治国经验等方面有长期积累，愿继续与国内相关机构和专家学者加强交流、深化合作，共同为党中央决策提供参考建议。

五是推进形成党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不断增强党的对外工作“一盘棋”意识，继续加强统筹协调，充分调动各地方各部门参与党的对外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协同水平，形成更大合力，齐心协力推动党的对外工作实现新发展新跨越。与此同时，要继续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通过党的对外工作积极服务国内经济社会发展 and 地方对外交流合作。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要通过与各地方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不断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积极贡献。